

放棄人口控制的“基礎理論”錯在哪裏？-李尚勇 的博客-財新網-財新網



2017年01月02日 04:55 閱讀：3346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導讀】本文（本書）證偽的邏輯是：如果能夠證明人口民粹主義的“基礎理論”不成立，那麼，它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偽人口理論體系”便坍塌了，其它引申出來的奇談怪論自然不屑一一駁斥。這正如，我們不需要去找出某台設計複雜的永動機的所有“貓膩”，隻需要確認它是永動機即可。

說明：因為考慮到有部分網友是第一次閱讀我的文章，所以需要介紹一些基本概念和背景知識，但這樣一來，有些內容與之前的文章便有些重複，這隻能請網友原諒。若你已經讀過相關內容，請跳過它們，直接讀後麵的內容。

（一）

《大國空巢》是“放鬆、放棄人口控制”錯誤思潮的最早倡導者，是人口民粹主義思潮的始作俑者。

民粹是一種平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民粹的主要特質就是平民對政府的怨懟。

民粹主義（populism，又譯為平民主義）是指平民論者利用平民不滿現狀的意見或不滿情緒形成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主張。

人口民粹主義杜撰偽人口理論，並利用部分民眾對計劃生育的不滿情緒，向政府施壓，企圖影響政府的人口政策，迫使政府放鬆繼而最終放棄控制人口的基本國策。

《大國空巢》和《中國人太多了嗎？》是人口民粹主義的代表作，他們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國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大國空巢》的人口理論有兩個基礎，一個是“資源無限”，另一個是“生育意願降低”，前者是他的“立足點”，後者是他的“基礎理論”。

人口民粹主義者都是“資源無限論者”，其論證問題的基本手法更多地表現為“想當然”。

例如，《大國空巢》認為，“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消耗隻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變為新的資源，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太陽每天提供地球大量能源，地球怎麼可能缺能源？地球上水麵積比陸地麵積還多，怎麼會缺水？”；若將高山變為平地就可以將“西藏水調去（新疆）塔裏木沙漠”，並“形成水氣”，“西北將（因此而）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

本來，目前的農業技術隻能利用全球綠色植物1%的淨生產能力，所以目前地球最多隻能養活80億人口。但該作者卻毫無根據地預言說，未來遺傳學的突破“完全可以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可利用植物比例，意味著可以養活另外80億人口”。他甚至斷言，“即便中國人口真的達到15億、甚至20多億，糧食也不是問題”。

《大國空巢》的“資源無限論”建立在上述“未來可能出現的高科技”基礎上，而“未來高科技”需要開發“人腦”這一“終極資源”，因此，保持大量人口是“開發人腦”的必要條件，所以需要鼓勵生育長期維持人口增長。

該書作者認為，“人腦是終極資源，隻要科學技術在進步，自然資源永不會枯竭。環境、氣候、資源問題的最終解決，在於開發‘人腦’這一‘終極資源’，而不是減少人口”，“人口減少意味著開源的智力減少”。

他認為，“看來已經窮盡的資源，實際還具有無限的潛能。偌大一個地球，我們也還隻是在皮毛上循環地用了一點陸地資源”；“就可預計的技術條件而言，地球養活數百億人口沒有問題”。

顯然，“資源無限論”缺乏現實基礎，這種“樂觀主義”對於解決現實和眼前的資源環境問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三體”時代的核聚變發動機固然令人神往，但現實是大麵積嚴重霧霾籠罩了中東部大部分地區）。現實的資源非常稀缺，並且已經“稀缺”到需要用戰爭去維持的程度；環境容量非常有限，並且已經“有限”到容不下高級生命的地步。（《人口困局》對此有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當然，以“資源無限論”為基礎的所有人口政策主張，最後都落入了“偽人口理論”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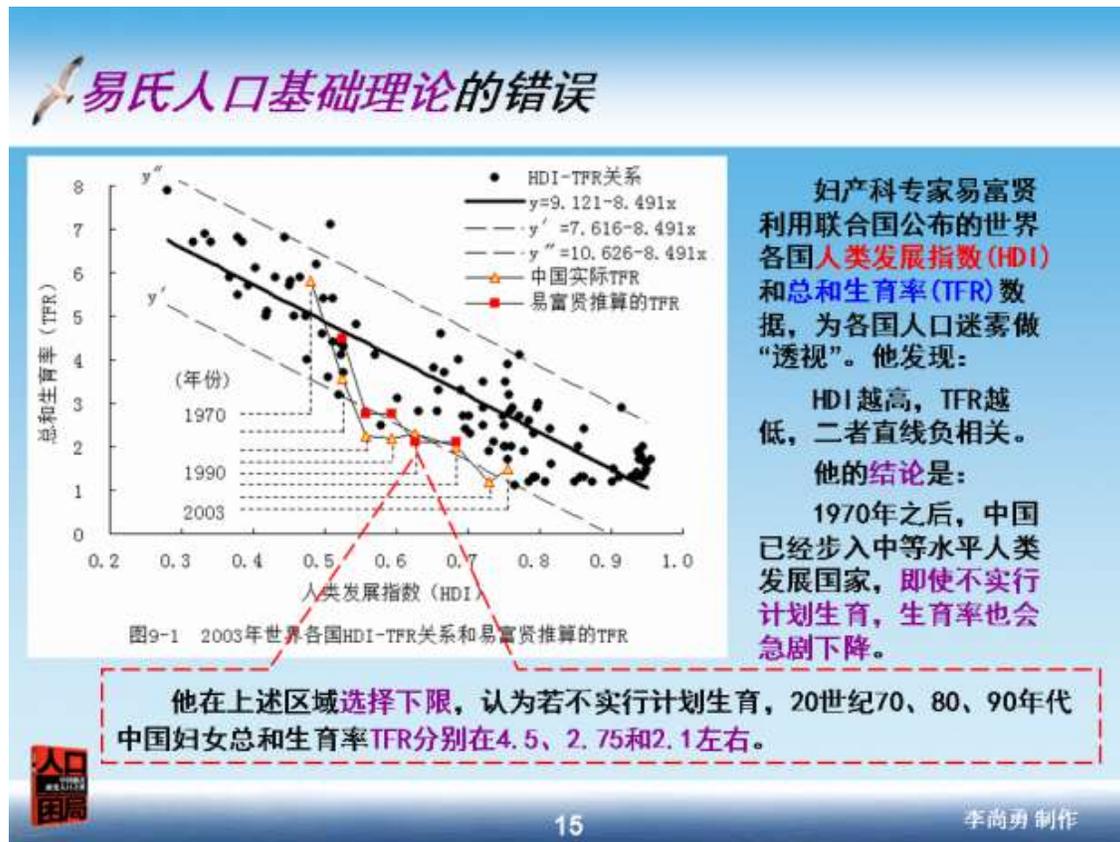
（二）

《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婦產科專家）運用他的醫學專業思維搭建了他的人口“基礎理論”。據他自己說，他是利用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各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和總和生育率（TFR）數據，為各國人口迷霧做“透視”。具體說就是，他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各國HDI與TFR的數據，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線負相關”。他據此繪製了“HDI-TFR關係圖”。（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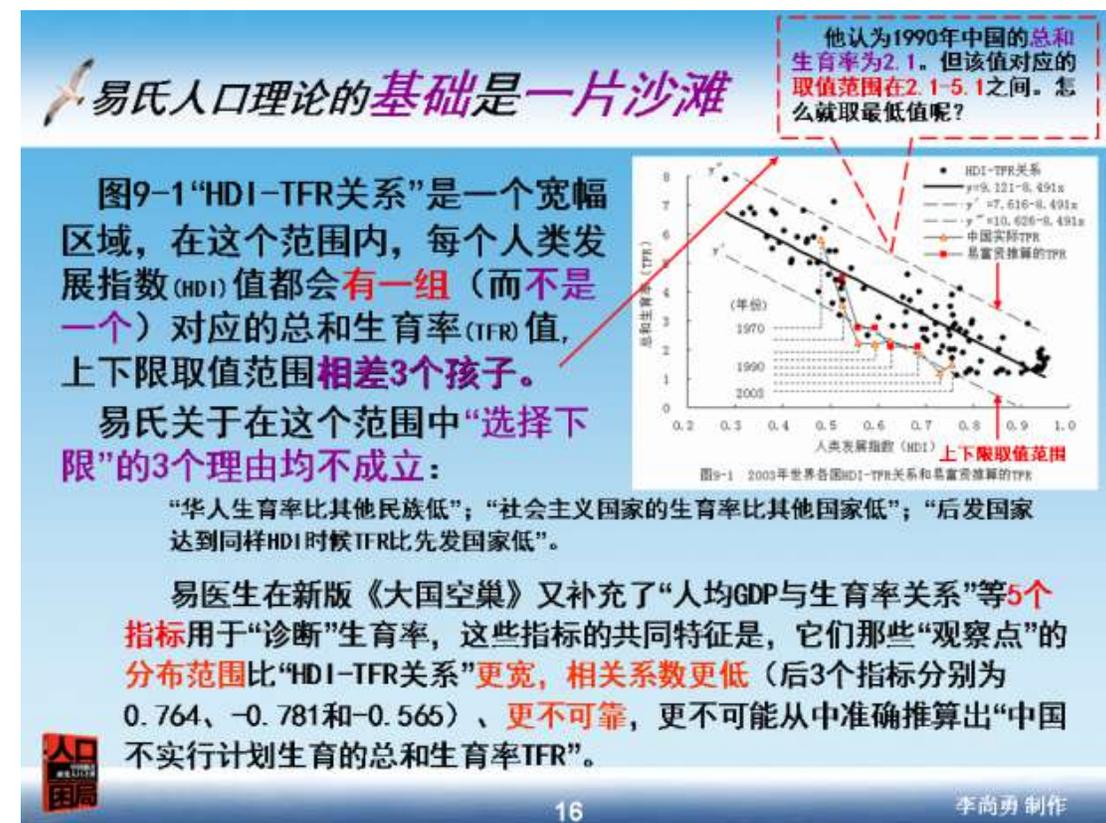
易醫生使用的是統計學“簡單直線回歸”分析方法，即利用過去的一些數據，以“最小二乘法”導出一個直線回歸方程，再利用該方程預測或推算未知區域的情況。

在嚴肅認真的研究態度下，對於呈現線性相關的觀察點，直線回歸分析是一個簡單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它常常被急功近利者所濫用。

易醫生的《大國空巢》應該可以作為濫用直線回歸分析的典型而載入統計學教案。（《人口困局》第222頁）



然而，易氏人口理論的這一基礎是一片沙灘：



“易氏人口理论”错误的根源

统计学原理再三强调，首先需要定性研究并确认两组数据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并判明其相关性质，才能运用数学方法去确定直线或曲线回归方程，否则，**滥用这一方法**，会出现“不相干”的逻辑错误，得出荒谬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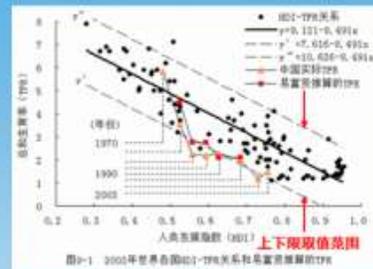


图1-1 2005年世界各国HDI-TFR关系及基础繁殖率的TFR

易氏无视统计学的再三警告，用“不相干”的“HDI-TFR关系”推导中国的生育率，必然出现根本性理论错误。

中国人口学家需要反思：一个整脚理论家的充斥着低级错误的“伪人口理论”，为什么能够撬动中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甚至影响到国家高层的人口决策？



易氏人口理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易氏的基本结论是：若不实行计划生育，20世纪70、80、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TFR会自然依次降低为4.5、2.75和2.1左右。

实际情况是：

(1) 1970年实行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生育多子女妇女的响应（她们受多子女拖累而不堪重负），计生效果立竿见影，全国总和生育率（TFR）从1970年的5.81迅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

没有计划生育，上述情况绝无发生的可能性，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以人头定口粮的年代（农民多生孩子多分粮）

(2) 计划生育政策在年轻家庭和年轻妇女中受到强烈抵制，1980年总人口接近10亿，1980年代初TFR强劲反弹，达到2.86。于是，严厉、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出台。1993年，总和生育率（TFR）首次低于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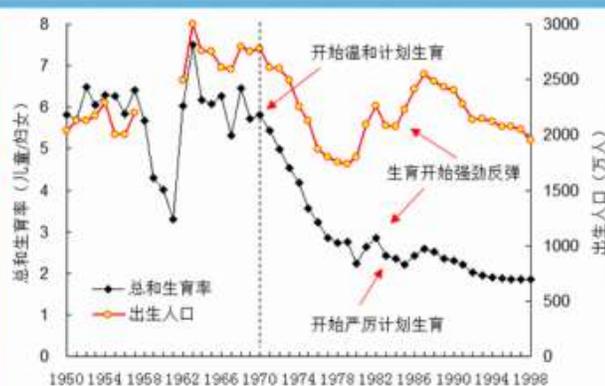


图11-3 1950-1998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出生人口

可见，没有计划生育，在1970—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自然降低到2左右。



详细论证见《人口困局》第225-231页：

9.1.2 易氏人口“基础理论”证伪

易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人口理论的“基础”其实是一片沙滩。

①所谓的“HDI - TFR 关系”在理论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说”，即它仅仅是一个建立在有限统计资料基础上的经验数据，它并没有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在科学上，欲利用“假说”推理往往需要预设一些苛刻的前提条件，而且需要很大勇气，因为那容易出现“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作为一组观察数据，我们的确可以从某一年的“HDI - TFR 关系”中看到“HDI 越高、TFR 越低”的现象，这的确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定性分析论据，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幅度很宽的区域，所以像易先生那样（见图9-1）试图在这个区域内求解准确的“HDI - TFR 关系”数据，显然过于为难数学和统计学。

②目前表现出来的总和生育率（TFR）随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提高而降低的总体态势，只是人类社会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现象。从人类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HDI - TFR 关系”在未来很可能会“触底反弹”。（这一点将在第10章第二节详细讨论）

③受 HDI 计算方法的影响，不同报告期计算的同一年人类发展指数 HDI 并不相同。报告人曾专门提示，不同报告期计算的 HDI 值“不具有可比性”。实际上，用同一或不同报告期数据计算的相关系数 r 的波动都比较大，而直线回归方程的回归标准差 S 差异更大。（见图9-2）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对人类发展情况的总体衡量尺度。它从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衡量一个国家取得的平均成就”，即分别由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构成，并且是这3个“标准化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上述3个指数计算公式中的基础数据会定期更新。比如，在2010年的报告中，预期寿命的最大值取自2010年的日本（83.2岁），最小值20岁；平均受教育程度最大值取自2000年的美国（13.2年），最小值为0；人均收入（2010年之前用人均GDP，之后用人均GNI，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最大值取自1980年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08211），最小值取自2008年的津巴布韦（\$163）。^①

例如，笔者用2005年、2010年、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HDI数据

^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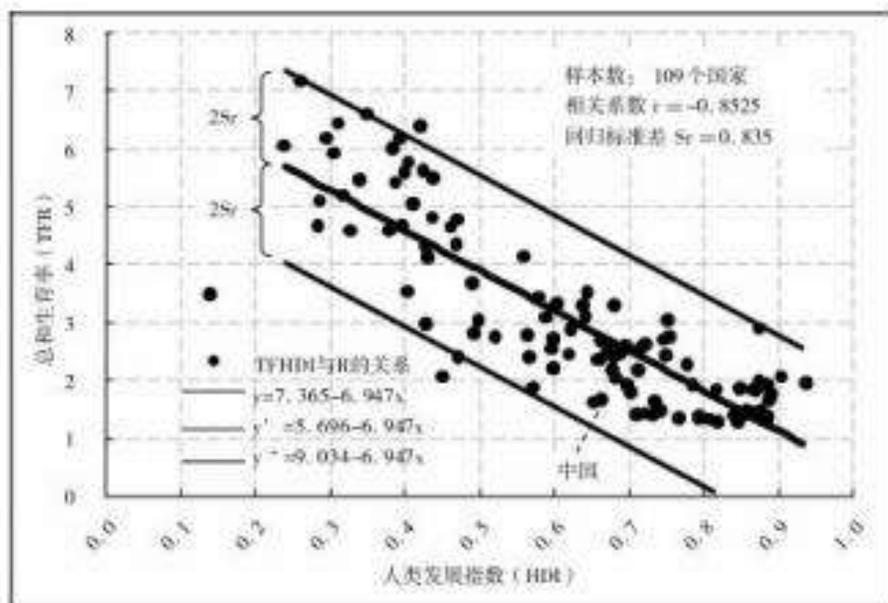


图 9-2 2010 年世界各国 HDI 与 TFR 的关系

资料来源和说明：(1) HDI 数据来自联合国《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2) TFR 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 修订）》（1950—2100 主要区域、地区和国家的总生育率）；(3) 样本国家人口超过 500 万人。

和《世界人口前景（2010 修订）》TFR 数据分别计算了 1970—2010 年的“HDI-TFR 关系”及其直线回归方程的相关数据，结果显示，相关系数 r 的波动范围在 -0.8076 到 -0.9072 之间；由相关系数 r 抽样误差 σ 计算的概率 95% 的置信区间下限范围在 -0.7365 到 -0.8728 之间（可靠性明显降低）；直线回归方程的回归标准差 s ，在 1.175 到 0.820 之间波动。1970 年与 2010 年的回归标准差 s 相差 41%。（见表 9-1）

表 9-1 1970—2010 年“HDI-TFR 关系”及其直线回归方程的相关数据

年份	1970	1980	1990	2000	2003	2005	2010
相关系数 r	-0.8076	-0.8531	-0.8847	-0.8916	-0.9072	-0.8790	-0.8525
r 置信区间 下限	-0.7365	-0.7911	-0.8384	-0.8512	-0.8728	-0.8362	-0.8008
标准差 s	1.175	1.098	0.933	0.858	0.732	0.844	0.835
2 倍 s	2.350	2.196	1.866	1.716	1.504	1.688	1.670
3 倍 s	3.525	3.294	2.799	2.574	2.196	2.532	2.505

资料来源：2003 年数据的报告期是 2005 年（即《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1970 年、2010 年数据的报告期是 2010 年；其余数据报告期是 2011 年。

④“HDI-TFR关系”是一个宽幅区域范围，由此计算的直线回归方程，有一个以 y' 、 y'' 为上下限的观察、取值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给定的HDI值都会有一组（而不是一个）对应的TFR值。这一组TFR值的范围取决于推算或预测的精确程度。若将精确度确定为“概率95%”，则 $TFR = y \pm 2S_y$ ；若将精确度确定为“概率100%”，则 $TFR = y \pm 3S_y$ 。

举例来说：用图9-1直线方程计算，1985年，中国 $HDI = 0.594$ ， $y = 4.077$ ；

若概率95%，则 $TFR = y \pm 2S_y = 4.077 \pm 1.504$ ，TFR范围：2.573-5.581；

若推算或预测精确度要求100%概率，则

$TFR = y \pm 3S_y = 4.077 \pm 2.256$ ，TFR范围：1.821-6.333。（见图9-1）

可见，易先生“推算”80年代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自然总和生育率TFR为2.75，过于武断。

⑤易先生关于“中国总和生育率TFR只能在HDI-TFR关系图下限”的三个理由均不成立。

第一，根据《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TFR数据，不包括中国的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Less Developed Regions, Excluding China）1950—1970年的平均TFR为6.07（儿童/妇女）；同一时期，在剔除了1958—1961年的非正常生育年份后，中国平均TFR为6.13^①，略高于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育水平。这表明，易先生关于“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的判断不能成立。

第二，亚洲1950—1970年的平均TFR为5.65，亚洲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除朝鲜（3.50）低于亚洲平均生育水平外，蒙古（6.73）、老挝（5.96）和越南（6.92）均高于亚洲平均生育水平。

苏联在亚洲的8个加盟共和国的TFR为5.09，略低于亚洲平均生育水平；苏联在欧洲的3个加盟共和国的TFR为2.53，略低于欧洲（2.55）平均生育水平。（欧洲是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所以苏联的生育水平应该分地区比较。）

6个东欧国家的平均TFR为2.57，略高于欧洲（2.55）平均生育水平。

^①本书课题组：《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29。

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的 TFR 分别为 5.61 和 4.21，远高于欧洲平均生育水平。^①

可见，易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的判断也不能成立。

第三，易先生关于“后发国家达到同样 HDI 时候 TFR 比先发国家低”的判断，与其说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假说”，毋宁说仅仅是他的一个“感觉”。他没有为此提出具体数据，也没有给出参考资料，因而很难成立。实际上，在表 9-1 中， $2S_1 = 2.350$ 、 $3S_1 = 3.525$ ，这表示同一 HDI 数据的 TFR 值范围很大，很难说谁肯定比谁更低。在联合国历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有很多与易先生上述判断相反的情况（请注意，不同年份的报告不能比较）。例如，2010 年，印度的 HDI 为 0.519，TFR 为 2.73；危地马拉的 HDI 为 0.590，TFR 为 4.15。^②

总之，易先生为中国 TFR“选择下限”的 3 个理由均不成立。

⑥易先生关于“HDI=0.5 是个分水岭，HDI 超过 0.5 之后生育率都将快速下降”的命题是虚假的。

笔者利用 2005 年、2010 年、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前景（2010 修订）》TFR 历史数据计算了 1970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03 年、2005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的“HDI-TFR”相关数据，并绘制了“HDI-TFR 关系图”。从计算结果及其关系图来看，HDI>0.5 之后，TFR 呈现“宽幅”下降趋势，但没有明显的“分水岭”标志，更没有“快速下降”的现象。因为篇幅限制，本书不能一一展示这些数据和图片，读者可以利用上述参考资料自己计算验证。

⑦若考虑到寿命、教育和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分布，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将被大幅调低。

联合国 2009 年以前计算的 HDI 都没有考虑各国国内寿命、教育和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分布，因而其 HDI 被视为“潜在”人类发展指数，即在不考虑不平等问题时，该国可能达到的 HDI 水平。

从 2010 年开始，联合国在计算 HDI 的同时，还提供了“不平等调整后的 HDI”（Inequality-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IHDI 根据各国的不平等分布水平对寿命、教育和收入指数进行了折算，因此，它反映了各

①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 修订）》（1950—2100 年主要区域、地区和国家的总生育率）。

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

国人类发展的实际水平。

2010年,中国的HDI和HDI分别是0.663和0.511;2011年分别是0.687和0.534。两年分别调低了22.9%和22.3%。^①

⑧易先生根据他的上述错误人口基础理论推算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20世纪70、80、90年代TFR分别在4.5、2.75和2.1左右”。这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在“人民公社体制”(1958—1985年)下,我国农村60%—70%的食物,尤其是粮食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在当年全国人民普遍“吃不饱”的情况下,这种粮食分配制度明显会导致高生育率。20世纪80年代以前按家庭人口配发粮油肉布指标的“票证供应体制”,对城镇居民的高生育率也产生了类似效果。

有研究者提供的农村“第一手”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农民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抚养孩子的主要经济负担由家庭转移给了集体”,其“结果就是农村家庭的普遍多育”。第二,农民期盼家庭人丁兴旺、劳动力多,以便从集体多分食物和现金。那些孩子多且年龄小、家庭负担重的家庭,往往“把劳动力多(分配也多)的家庭看做值得自己效仿的榜样”。^②

笔者了解的农村“第一手”资料与上述情况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对农民多育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即农民多生孩子的短期和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大人的食物尤其是粮食的消费量,以缓解饥饿问题。因为2、3岁以下孩子的粮食需求量比较少,其分配的“口粮”可以补贴大人的粮食消费不足。

全国性饥荒之后两年(1962年、1963年)我国出生率和TFR“暴增”(见图9-3),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多生孩子以求多领一份口粮,以便度过严重缺粮时期;二是“人口真空区”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

所以,除开全国性饥荒的那几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全面启动较为温和的计划生育的前一年(197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始终处于6左右高位(1970年为5.81)。曾深入乡村研究生育情况的专家感叹说,在集体

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

②陈卫东:《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开放时代》,2010(3)。

化时期短缺经济状态下，村民“把自然状态下人口生育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①。

很显然，1970—1983年，上述维持高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没有理由认为总和生育率TFR会从6左右自然下降至2.75。

实际上，这一条件的实质性改变发生在1983—1985年，我国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随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这不仅让农民吃饱，而且也让全体国民吃饱了。

尽管如此，我国总和生育率TFR在1985—1998年自然下降至2.1的理由仍然不充分。因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最为严厉时期，即便如此，80年代我国平均TFR也还有2.46，1990—1998年平均TFR仍接近2。（见图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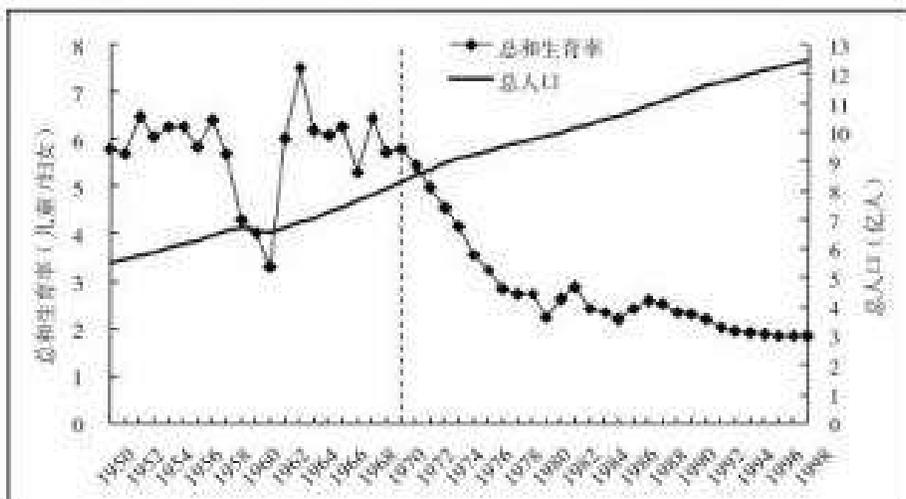


图9-3 1950—1998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总人口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TFR数据来自《中国发展报告20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图2-2）。（备注说明195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TFR数据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资料计算所得。）

图9-3突出显示了我国计划生育控制总人口的显著成效，即全国总和生育率TFR从1970年的5.81直线下降到1980年的2.24（儿童/妇女）。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情况绝无发生的可能性，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以人头

^① 郑卫华：《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J]》，开放时代，2010（5）。

定口粮的年代。(对计划生育功过是非的全面评论见第 10 章第五节)

⑨结论及推论：

上述分析显示，易先生的人口“基础理论”（由“HDM-TFR 关系”推算一国自然总和生育率 TFR）并不成立；

易先生依其“基础理论”推算“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20 世纪 70、80、90 年代自然 TFR 分别在 4.5、2.75 和 2.1 左右”，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易先生依此推算的有关中国的一系列人口数据靠不住；

易先生依此推算数据否定我国基本国策，否定 30 年控制总人口的显著成效站不住脚。

如此一来，易先生洋洋几十万字的庞大人口理论也随之坍塌了；

易先生的推论 1（计划生育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不成立；

易先生的推论 2（毛泽东在人口方面并没有错）不成立；

易先生的推论 3（马寅初《新人口论》可以导致亡国）不成立；

易先生的推论 4（我国基本国策决策错误）不成立；

易先生的推论 5（包括联合国人口专家在内的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也不成立。

易先生花了大量笔墨批评联合国的人口预测，说“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①。其实，人口预测不准确应该是常态，这就像市场价格预测永远也不准确一样。

人类是最为复杂多变的高级生物体，其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不确定性。你不可能知道那个具体的人下一分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这导致你无法准确预测以人为集合的社会行为。这是计划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你根本无法“计划”）。市场经济的成功不是准确预测市场，而是通过分散决策，灵敏地捕捉市场和价格信息，而所有这些信息其实都已经是“过去式”。

人口预测也是如此，任何试图准确预测人口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也包括易先生）。人口预测的主要目标不在具体的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口的发展趋势。例如，联合国多年连续跟踪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就是各国的人口趋势，它并不以准确预测各国的现实人口为目的，而是根据各国实际

^①易富贤：《大国空巢[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71。

2013年，隨著人口民粹主義泛濫，《大國空巢》在大陸出了簡體版。

新版《大國空巢》除沿用上述人口“基礎理論”外，又補充了“人均GDP與生育率關係”、“婦女受教育程度與生育率關係”、“性別不平等指數與生育率關係”、“避孕率與生育率關係”和“城市化水平與生育率關係”等5個指標用於“診斷”生育率。

但是，這些“診斷”指標的共同特征是：它們那些“觀察點”的分布範圍比“HDI-TFR關係”更寬，相關係數更低（後3個分別為0.764、-0.781和-0.565）、更不可靠，更不可能從中準確推算出“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總和生育率TFR”。（見後麵“幻燈片21”之“圖11-4”）

（三）

人口民粹主義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中國人太多了嗎？》。這本書有兩個特點，第一，大肆鼓吹完全放棄人口控制、鼓勵生育；第二，該書的理論“基礎”更加薄弱，杜撰的“人口規律”也更粗糙、更缺乏嚴密論證。

筆者對其證偽的邏輯是，若證明了它的理論“基礎”是荒謬的，那它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所有觀點、主張就都是荒謬的。（證偽見下圖）

 《中國人太多了嗎？》錯誤百出

- ❖ 與《大國空巢》不同，這本薄薄的小書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稱之為“理論”（哪怕是錯誤理論），而2位作者杜撰的“人口規律”也更加粗糙且缺乏嚴密論證
- ❖ 梁氏杜撰了一個人口“規律”：
 - 僅僅選取了22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與生育率關係”數據就貿然總結出“一國人均收入的提高必然伴隨生育率下降”的規律，並詐稱“這一規律在所有國家和社會都得到了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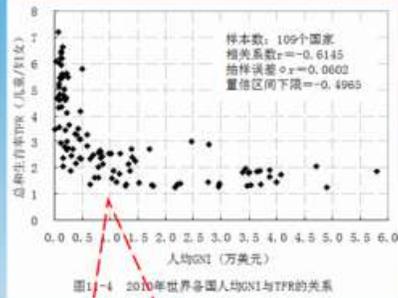


20 李尚勇 制作

“人均GDP与生育率关系”——没有相关性!

其实，港版《大国空巢》曾试图用这个“人均GDP与生育率关系”，但因其相关系数太低（仅-0.656）而被易氏放弃。

笔者后来计算2010年109个国家的“人均GNI与生育率关系”（比“人均GDP”更能体现国民收入水平），其相关系数仅-0.6145，而95%概率的置信区间下限低至-0.4965，而且，在该关系图中，那些“观察点”呈“L”形状，而非“\”线性分布。



这表明，二者完全没有相关性分析的利用价值。



《中国人太多了吗?》错误百出

❖ 该书的另一个“理论支柱”是：

- “人口越多，科技创新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年轻人的规模、基数越大，天才就越多”，今后20-30年，“哪个国家具有较多的高素质人才，根本上取决于其人口规模”

❖ 如此荒谬的理论只需问一句：

- 中国人口的零头都比美国多，中国高素质人才怎么比美国少得多？

事实上，对人口大国来说，人口越多，制造的廉价劳动力就越多，就业压力、就业竞争就越大，普通劳动者的工薪也就被压得越低。当然有部分人群从中受益，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

正因为如此，有不少网友强烈怀疑人口民粹主义者人心叵测。



“鼓励生育”的严重后果

“二本书”都持“鼓励生育”的错误观点：

《中国人太多了吗？》
结束语喊了如下口号：

“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放开、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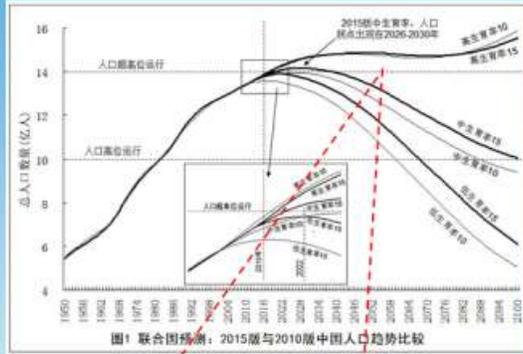


图1 联合国预测：2015版与2010版中国人口趋势比较

若“鼓励生育”，中国的人口趋势必然滑向联合国“高生育率2015”所指向的人口趋势——那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真正下行“拐点”，意味着中国“人口超高位运行”将持续百年以上，意味着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将崩盘。



(四)

下面的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生育是私权范围内的事，国家不应干涉。

若当初不控制人口，中国会多出生4亿多人，而且这4亿多人都可以自由生育，再加上同样可以自由生育的13亿人口

——那局面将如何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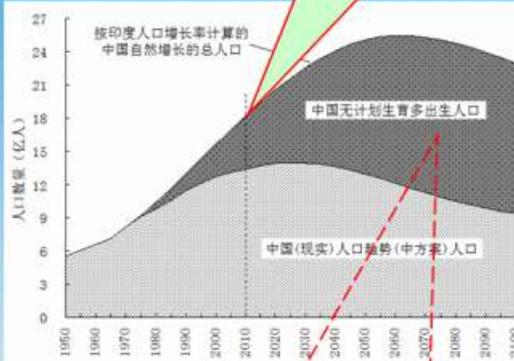


图10-2 按印度人口增长率模拟计算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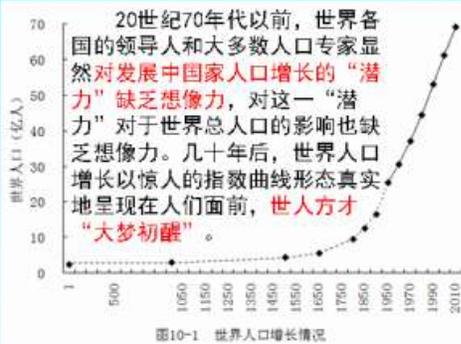
1970年代中期，印度控制人口政策失败，故可以将印度视为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看待。上图将印度人口增长率看成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模拟计算出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宣言曾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9年也有类似规定）

但10多年后，联合国1994年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在界定妇女基本人权时，**已经不再包含上述规定。**



1999年世界第60亿人口出生时，联合国选择1名新生儿作为里程碑事件的标志，以示庆祝。

2011年世界总人口达到70亿人时，联合国不再这样做。联合国有关官员对这一转变的解释是：“**我们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庆祝**”。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消亡。

中国生育水平维持在1.6，大约55年，总人口就减少48%。



这是最典型的**杜撰人口数据**！看看联合国的数据：55年后总人口下降小于20%。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用更大人口规模去保持大国地位、维持经济繁荣。

人口民粹主义者把自然界看作征服的对象，把人看成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

《人口困局》的作者相信，对自然界有“征服欲”非常危险，其结果往往是被自然界所征服、所消灭，而“把人当成工具和手段”则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对立面，它体现的是“人的异化”，必将自食其果。

作者始终把人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并且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谋求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1950-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



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本质：就是通过人为提高生育率，增加劳动力数量，扩大劳动力竞争，从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工薪），提高资本利润率；官僚集团亦从中获利。

这种自私自利行为，完全罔顾中国14亿人口的现实困局，罔顾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

对社会统治者来说，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既获得了“红利”，就得承受人口压力，承受就业、养老和人口老龄化等等压力。



人口民粹主义的典型错误观点：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即使中国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20多亿，粮食也不是问题。

适度人口规模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一国可资利用的资源、环境和科技水平而变动，但在给定资源、环境和科技水平的条件下，理论上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适度人口规模。

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方向各异的研究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中国最大人口容量为15亿-16亿人，而超过18亿-20亿人就可能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打击；

大多数计算机最优人口模型的研究结论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的人口规模为7亿-10亿人**。



(五)

當初（1970年代初），中國計劃生育決策的基本依據是，資源與人口關係緊張，這表現為人口增長對資源和社會經濟的巨大壓力。

30、40年後的今天，不僅資源與人口的緊張關係沒有緩解，而且還增加了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係。

為了應對資源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係，我們隻能選擇大幅度降低食品質量和安全性以喂飽13億、14億人口，盡管如此，中國的資源、環境形勢還是難以承受，並已經不堪，局部危機頻現（眼下，中東部大麵積嚴重霧霾，北方地區大範圍嚴重缺水，全國範圍內嚴重水汙染，局部地區隨時可能爆發大規模水汙染危機）。

結論便是：當初製定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容否定，今天繼續實行控制總人口的基本國策更加毋庸置疑。

目前，中國人口增長來到了“三岔路口”，需要正確的人口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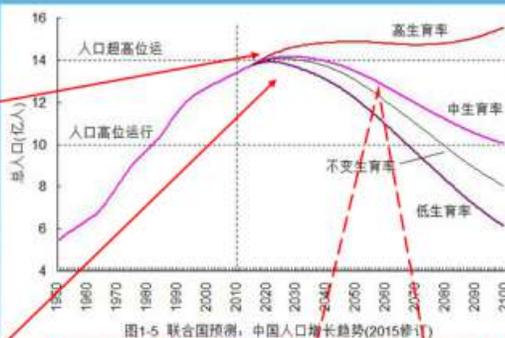
目前，中国人口增长来到了“三岔路口”

❖ 若此时“**放松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很可能会滑向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

- 那意味着人口增长的真正“拐点”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意味着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会崩盘

❖ 若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就有可能在短期内（2025-2030）迎来人口增长的真正“拐点”

- 人口趋势将运行在“**中生育率方案**”
- 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的概率增大



在“有很好的数据和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估计，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5-1.6**。这个数据与联合国“**中生育率方案**”的数据接近。



目前，中国人口增长来到了“三岔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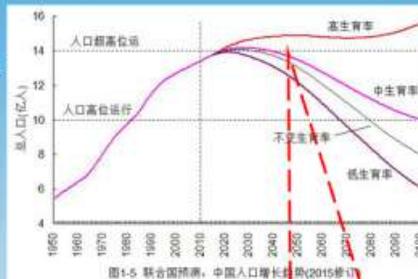
❖ 2011年，联合国人口专家首次披露了当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即“人口生育率的**细微变化**可能造成世界人口总数的**显著差异**”

- 这一规律的原理是：在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人口增量就越多**

❖ 显然，这一规律在中国后果更为严重

- 对于庞大的13亿、14亿人口来说，即使总和生育率“**细微**”增加，其“**人口增量**”也惊天动地

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总和生育率1.84→2.20→2.30
 联合国“**中生育率方案**”，总和生育率1.59→1.70→1.80
 高、中方案总和生育率**相差0.25→0.5→0.5个孩子**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估计，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在**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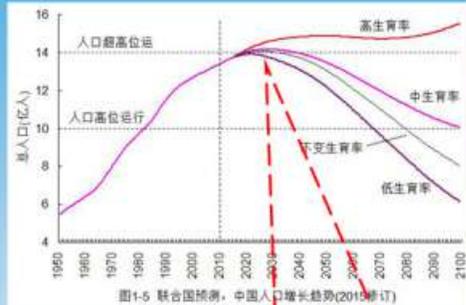


“**稍微放松**”人口控制（高、中方案总和生育率**仅仅相差0.5个孩子**），人口趋势将滑向“**高生育率方案**”。



目前，中国人口增长来到了“三岔路口”

- 目前，促进“人口增长拐点”的出现，有三个有利条件：
 - 30年严控总人口终于为人口增长“拐点”的出现争取到了有利时机
 - 总和生育率在1.5~1.6，满足联合国“中生育率方案”的条件
 - 城镇人口的生育意愿已有明显下降，计划生育阻力下降
- “稍微放松人口控制”，总和生育率仅仅比“中方案”增加0.5个孩子，中国的人口增长在整个21世纪便没有真正向下的拐点
 - 这意味着，中国几十年控制总人口的成效将化为乌有，人们曾经的努力和遭受的痛苦也都白白“浪费”了



错失这个“拐点”时机将成为历史罪人。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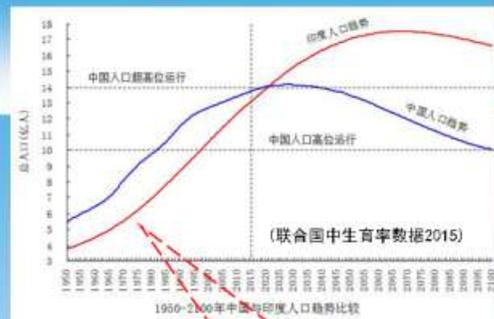
李尚勇 制作

吸取印度的历史教训

1970年代中期，印度因忧虑生育水平太高、人口增长过快，曾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强制实行绝育政策。

但是，印度控制人口的努力最后归于失败，原因有四：

- 印度社会宗教色彩浓厚、种姓制度盛行、各种情况错综复杂
- 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极低
- 当时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
- 当时政策的执行生硬、粗暴，强制绝育政策遭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印度教下层民众和穆斯林的强烈反对



印度试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未果

印度未来会因为“人口压力指数”全球第一而遭遇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国际冲突。



34

李尚勇 制作

筆者對國家人口政策的總的建議是：

控制總人口的基本國策不能動搖，計劃生育政策不能放鬆，但控制總人口的具體做法可以更加人性化。過去計劃生育的一些過激、極端做法應該堅決停止，利用計劃生育“尋租”腐敗的惡劣行徑必須嚴加打擊。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弄清國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真實的生育率情況，確保中國人口增長趨勢在聯合國中生育率方案範圍內，確保最近10年內人口增長出現真正向下的拐點（而不是假拐點），從而實現中國人口高位運行“軟著陸”。

2016年12月31日

友情提示：該係列文章的下一篇是《人口高位運行“軟著陸”與“硬著陸”》

延伸閱讀：